

我的学术生涯

徐匡迪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· 上海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学术生涯 徐匡迪著 上海：上海大学出版社，

2009

陈景润 陈景润 陈景润 陈景润

I 我 徐匡迪 II 徐匡迪 III 徐匡迪-自传 IV 徐匡迪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3456 号

策 划：董庆九 周绍明

责任编辑：安泰 丁养兵

装帧设计：张天志

版式设计：孙瑶

正文摄影：王元晶

技术编辑：章斐

我的学术生涯

徐匡迪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2000 号 邮政编码 200000)

(电话：021-55111111 发行热线 021-55111111)

出版人：姚铁军

上海华业装璜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mm×1092mm 印张 15 字数 25 千字

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陈景润 陈景润 陈景润 陈景润 定价：15.00 元

目

录

- 一、自述 徐匡迪 员
- 二、我的学术生涯 猥
- 三、在《徐匡迪文选——钢铁冶金卷》首发式
上的讲话 猥
- 摇摇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淀佐院士致欢
摇迎词 猥
- 多年潜心研究的智慧结晶
- 摇——上海大学党委书记、常务副校长
方明伦教授的讲话 猥
- 进一步推动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
- 摇——科技部部长徐冠华院士的
讲话 猥
- 上海大学党委常委、副校长周哲玮宣读

- 摇原全国政协副主席、上海大学校长
摇钱伟长院士的贺信 源
- 对匡迪同志研究所从事部分研究
摇结果的分析
- 摇——师昌绪院士的讲话 源
- 他为促进上海经济社会全面协调
摇发展贡献卓越
- 摇——上海市副市长严隽琪教授的
讲话 缘
- “乘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
- 摇——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
院士的讲话 缘
- 教书育人，桃李满天下
- 摇——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教授的
讲话 缘
- 激励同行摇指引未来
- 摇——原全国政协副主席、原中国
工程院院长宋健院士的讲话 源
- 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致答词 苑

- 四、在《徐匡迪文选——钢铁冶金卷》首发
座谈会上的发言 苑源
- 摇摇有这样杰出的科学家,我们为之而骄傲
- 摇——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刘玠
院士的发言 苑源
- 他在每个历史阶段都做出了杰出贡献
- 摇——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顾问、原冶金
工业部副部长吴溪淳的发言 苑源
- 学者风范摇高深造诣
- 摇——中国材料协会会长、中国工程
院化工、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
主任周廉院士的发言 愿原
- 教授一定要密切结合实际
- 摇——张寿荣院士的发言 愿远
- 匡迪是我们的楷模
- 摇——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、钢铁研究
总院院长殷瑞钰院士的发言 愿远
- 要实现现代化,冶金工业是非常重要的
- 摇——中国金属学会理事长翁宇庆教授

- 的发言 愿
- 匡迪是领军人物
- 摇——原东北大学校长陆钟武院士
- 的发言 愿
- 培养人才不仅为今天,更要立足未来
- 摇——北京科技大学柯俊院士的
- 发言 愿
- 我们有义务培养新一代钢铁人
- 摇——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徐金梧
- 教授的发言 愿
- 五、《徐匡迪文选——钢铁冶金卷》序
- 摇 殷瑞钰 愿

一、自摇摇述

徐匡迪

我家祖籍运河岸畔的崇德 ,县治在今浙江省桐乡市西南 ,父母寄寓杭州。“楼观沧海月 ,门对浙江潮” ,简洁传神地描绘了故里雄奇明秀的水色山光。

难忘的童年记忆

1937年 7月 ,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。8月初 ,日军偷袭杭州湾 ,在金山登陆 ,扑向嘉兴、苏州 ,父母于颠沛流离的逃难路上生下了我 ,取名“抗敌” ,希望我永记国恨家仇 ,精忠报国。读书后 ,一位老先生征得父母同意 ,帮我改名匡迪 ,寓意于“匡扶正义 ,迪吉平安”。摇

我的童年是在云南昆明度过的。抗战时期

的昆明是西南的文化中心，北大、清华和南开大学内迁昆明后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大，但大批毕业生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，于是不少人屈就于小学任教。我就读的小学，许多老师都是西南联大的优秀毕业生，他们爱国的热忱，勤奋的教学，深深地融入我们幼小的心灵之中。

我忘不了国语老师朗读爱国诗人陆游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”诗篇时的悲壮激情，也忘不了历史老师讲述岳飞、文天祥、史可法等爱国志士浴血抗敌、以身殉国的情景；更忘不了地理课堂上，一位东北籍老师一边在黑板上画着山河破碎的中国版图，一边流着热泪说中国像一片大桑叶，日本帝国主义就像一条蠹虫，正在一点一点地蚕食我们的国土。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我亦年已花甲，但每每忆及这些情景，仍会潸然泪下，激动不已。

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，在处于人生转折关头、选择事业的重要时刻，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祖国利益高于一切，始终是鞭策自己的

座右铭。

1945年秋,终于盼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投降。不久,我随父母离开茶花艳若朝霞的春城,回到西湖之滨的家园。

青少年时代,我就读于省立杭州高级中学(杭一中),这是一所全省招考、择优录取的寄宿学校,著名的教师,朴实的校风,严谨的教育,为我们打下了品行和知识的基础。座落在古朴美丽校园中的科学馆、图书馆,是最吸引我的两个地方。每当读到一本好书,常常是爱不释手,养成了一生对书籍的爱好。而蝴蝶标本的制作成功,西湖水酸碱度随季度变化的测定等等,使我养成要搞清一个自然现象,必须亲自动手,细致地做好每一件小事的习惯。它们都使我终生受益无穷。

立志投身钢铁事业

1948年初,临近高中毕业,同学们开始思考理想和志愿。“一切服从党安排,祖国的需要就

是我的第一志愿”这是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心声。当时,正值国家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,提出“钢铁工业是一切工业基础的基础”。报纸上几乎每天大幅报道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、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高炉胜利开工的消息。我被火热的钢铁工业深深吸引住了,决心以钢铁冶金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。

1950年,我如愿考上号称“钢铁摇篮”的北京钢铁学院,从而和钢铁结下不解之缘,一干就是三十多年。

在大学里,我开始了解到我国古代曾有过冶炼技术的辉煌业绩,对推动中华古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抹。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,发展近代钢铁工业,也曾是几代中国仁人志士的梦想,但都被腐朽的社会所吞没。新中国要强盛,必须要有自己的钢铁工业。当时我国钢铁工业与欧、美的巨大差距,激发了我们那代大学生的奋发学习激情。五年的大学生活是紧张而丰富多彩的,当时尽管教学设施远比现在简陋,但一大批我国

著名的冶金学者,如魏寿昆、林宗彩、朱觉等教授的言传身教,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。实践表明,我国的冶金学科教学水平决不逊于世界先进国家。记得1982年我在瑞典一家公司担任副总工程师时,一天总裁拿来一份钢包喷粉处理设备的设计书让我审阅,我发现钢包内钢液流动的计算有误,不符合流体力学的原理,就向一位美国名校毕业的机械设计师指出,当时他颇不服气地问我:“你在哪儿受的教育?是美国?是英国?”我说:“既不是美国,也不是英国,而是中国。”这场争论,最终公司总裁把真理判给了中国毕业的我,还要我给公司工程技术人员讲述冶金过程中熔体流动的流体力学。

绚丽的北钢大学生活,不仅为学生创造了专业学习的良好环境,而且给学生提供了参与自身管理的锻炼机会。我先后加入过校田径队、合唱队、足球队和管弦乐队,担任过班长、团支部书记、总支委员和校学生会副主席。五年的“钢铁摇篮”生活,为我奠定了治学的根底,确立了做人

的根本。

成果来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

1956年,我从北京钢铁学院调到上海工学院(今上海大学)任教。那一年中国科技战线有两件大事:

一是周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,号召科技界发挥主人翁精神,加强责任感,正确处理理论和实践、任务和学科的关系,认真实现领导、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,以及科研机关、学校和生产部门的紧密协作。

二是国家正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,要求自力更生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,在重要的和急需的方面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。

钢铁专业既有理论上的深度、难度,又有很强的实践性。要想在特殊钢的品种、质量上取得突破,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下苦功夫。我和上海工学院的师生投入理论联系实际,教学与

科研相结合的天地,带着问题去工厂实践,和车间工人、技术人员一起改进不锈钢炼钢工艺,炼出了因苏联撕毁合同后,国防急需的高纯度航空用不锈钢。

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使我正开始的几项科研工作被迫中断,还曾下放安徽省凤阳“五七干校”。在知识受到践踏,知识分子斯文扫地、报国无门的1969年,我亦有过短暂的困惑和忧闷。“狂来欲碎玻璃镜,还我青春火样红。”但是,不甘岁月蹉跎的责任感,推动我在灯下系统地自学了新的专业基础理论和英语。

耕耘不会没有收获。1978年12月18日的全国科学大会上,小平同志拨乱反正的讲话仿佛驱散阴霾的晴空丽日,融化了极左路线歧视知识分子的百丈寒冰,送来了暖彻心头的阳光。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神州大地。

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,我和同事们在钢铁冶金学科中抓住国际上的发展前沿,共完成六项科研任务,其成果均先后走向工业应用,其中超

低硫深海石油管线用钢还取得英国和瑞典专利权。

我的微薄贡献,受到了党和政府的莫大鼓励,授予我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、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荣誉。1984年初,又给予我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短期访问学者和受聘瑞典斯堪的纳维亚·兰塞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、技术副总经理的机会,使我眼界更加开阔,技术上日臻成熟。

钢铁冶金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。1984年初,组织上要我走上党政领导部门工作。1985年10月,要我挑起上海市长的重担。我仍旧割舍不了对自己专业的恋情,继续担任着上海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母校——北京科技大学钢铁冶金专业兼职博士生导师,经常利用周末和晚上的时间,指导着两位在读的博士研究生。

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。”回顾自己所走过的生活历程,我衷心感谢师长们春风化雨的教诲与同事们雪中送炭的帮助,感谢党组织给予我

的教育与激励 ,我将不断努力 ,回报养育、培养我的祖国。

原载《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》 ,
上海教育出版社 ,~~1998~~

二、我的学术生涯

“八一三”日军侵占淞沪，父母亲携着圆岁的姐姐以及腹中临产的我，匆匆逃离上海，随着难民潮艰难地向西南撤离。由于旅途颠簸劳顿，我于1937年底（12月17日）提早出生于浙赣交界处松岭的一座古庙中，没有医生和助产士，甚至没处去找农村的接生婆，只能由父亲在母亲的指挥下为我接生。当时，年轻父母既为家中新生的儿子高兴，又感忿于国家积贫、积弱，日寇烧杀抢掠和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，致使老百姓处于如此浩劫之中，遂将我取名为“抗敌”，以铭记国恨家仇，寄望于子辈“男儿当自强，抗敌保家乡”。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45年我在昆明读小学二年级时，语文老师对我说：“日本侵略者失败已成定局，抗战胜利在即，我给你改个谐音的名字好吗？”随即用毛笔在毛边纸上写下：“匡迪”，寓意

“匡扶正义，迪吉平安”，我高高兴兴地捧回去呈给父母亲看，他们都说改得好，就改用此名至今。说了一段与学术生涯毫不相干的开场白，无非是两个目的：一是任何学术论文的作者都要署名，以示对论述及数据、结论负责，因此交待一下名字的来历，并非离题太远；二是我对祖国的热爱与赤子之心，始于童提启蒙学写名字之时，现在虽已过“天命”之年，每当提笔签名时，仍不敢忘双亲的期望与老师的教诲。

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人，在中国近代史上亦算是经历丰富的一代。曾亲历过民族危亡的抗战时期；目睹了战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；参加过欢天喜地、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的行列，并为新中国的成立而热情欢呼；更难忘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时唱着“共青团员之歌”争相报名参加“军干校”的高昂民族精神；当然也受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、肃反、拔白旗、反右等政治运动折腾。直到“文革”时，少数人如我，被作为修正主义的“苗子”，一下子变为